

作者简介: 蒋劲松: 蒋劲松,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 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兼职研究员。1985年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学学士, 1991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硕士, 1996年中国人民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博士。1996年起任教于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以及科学和宗教的?br>文章来源: 当代健康报(山东, 济南), 2008年2月21日
加入时间: 2008-02-22
阅读次数: 169 次

中医科学吗——我看纷扰多时的中医论争

蒋劲松

坚定地支持中医发展, 不仅是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视, 更是对科学精神的真正坚持。

多元开放而不是垄断霸道, 才是科学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科学的威信需要用谎言来维护吗

有位近代史上的伟人, 曾经是位西医, 在身患肝癌、药石无灵之际, 有人劝他尝试一下中医。他不愿意, 这不奇怪。也许他能感觉到自己已经病入膏肓没有希望了, 也许他信不过中医, 不想尝试, 也许他像那些得了乳腺癌却不愿手术的人一样害怕折腾受苦, 这些都是很正当的理由。他愿意放弃治疗也是他的权利。奇怪的是他的理由, 他说: "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 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 如何用药? 毋须服。"

而另一位曾经学过西医的大文豪却因此而大为感动, 说"人当濒危之际, 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 而他对于自己的生命, 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

莫名其妙的理由, 莫名其妙的感动, 莫名其妙的"理智"!

也许是由于病重的缘故吧? 显然, 这位病人的思路是混乱的。中医当然不能保证将他的晚期肝癌治好, 尤其是在耽误了那么长的时间, 西医已经束手无策之际。他至多能说, 中医诊断的思路和话语, 无法在西方医学的体系里得到辩护和证明, 中医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近代科学。他也可以说, 中医治病也不能百分之百成功

(这都是废话, 西医也是一样的)。无论如何, 他都不能以此来否定他所承认的中医可能将病治好的事实。当然, 即使中医能把他的肝癌治好, 他仍然能用上述理由不承认中医是科学。然而, 中医是不是"科学", 与中医能否治疗疾病, 毫无关系。假如他的目标真是要治疗疾病, 恢复健康, 他拒绝中医治疗的那些理由就很荒唐。

除非他有个更加"高尚"而"令人感动"的目标, 那就是不惜个人的生命和健康, 一心一意地捍卫"科学"的声誉, 防止中医"借机"坐大。我们不禁要问: 科学难道不是为人服务的吗? 难道我们必须要做科学的奴隶吗?

还有两位鼎鼎大名的历史学家梁启超和胡适的举动也颇堪玩味。当时国内最好的西医机构协和医院出了医疗事故, 误割了梁启超健康的肾脏。而胡适一向蔑视和攻击的中医, 却治好了他的疾病。结果, 两位强调科学精神的历史学家, 却不约而同地都对此采取了隐瞒和否认的态度, 其动机都是担心国人因此而排斥西医, 怀疑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肯定他们不以"个体案例否定全体", 不因个人的经历而否定西医和科学, 这是对的, 是符合科学精神的。

然而, 事情还有另外一面, 难道就能以全体来否定个案了吗? 科学的威信需要用谎言来维护吗? 在肯定科学价值的同时, 这些以科学精神自任的学界领袖们, 为何在这些个体案例上不敢承认西医的不足和中医的疗效?

显然，这些近代的名人们在中西医问题上，深受唯科学主义的影响，并不真正理解科学精神，误将科学当作不可怀疑和批判的神圣教条顶礼膜拜，甚至不惜隐瞒真相。在这样的思想领袖的误导之下，今天许多中国人没有成为科学精神的主人，反而变成了缺乏怀疑和批判精神的“科奴”。这是科学的异化，它是传统思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现代表现，违背了科学精神。

排斥中医是以“科学”的名义侵害民众权益

纷扰多时的中医争论主要纠缠在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上。其实，究竟把中医称作科学、东方科学还是伪科学，与务实的老百姓并无多大关系，那不过是如何定义科学的修辞学问题，关键还是疗效问题。其实，西方学界一般也并不把医学视为科学。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不仅具体的科学知识都是可错的，也不存在可以保证科学必然优越于非科学实践传统的所谓“科学方法”。而科学社会学则更深刻地揭示了科学与人类其他实践活动一样，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不是中立于文化的绝对标杆。另一方面，科学之外的医疗实践也常常能有效治疗疾病。既然是否“科学”与是否有效二者之间并无必然关系，将近代实验科学作为真理的惟一标准来裁判中医，就不过是唯科学主义的偏见而已，缺乏学理依据。

中医作为历史悠久的治疗传统，效果早已经为人们日常实践所验证，为民众所严重依赖，草根阶层更是迫切需要。因此，对中医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绝不仅仅是纯粹学术探讨的事，它涉及民众的切身利益，必须要认真聆听民众的声音。

从医疗市场的角度而言，中医是和西医相互补充、竞争的保健与医疗提供者。中医的命运应该由消费者的市场行为决定。如果中医果然有害无益，市场自然会将其淘汰。以所谓“科学”的名义排斥中医，不仅仅侵害了中医从业人员的权利，更是无端侵害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利。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美国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就曾对美国医疗市场上排斥或歧视替代医疗传统的做法提出过激烈的批评。他在经济学名著《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指出，对医疗业务施加限制，只允许按照流行的正统做法来垄断医疗市场，必然会减少进行医疗试验的数量，从而减缓了医学知识的发展速度，提高了医疗保健的市场价格。这是在侵害患者的合法权益。

垄断霸道是“伪科学精神”

众所瞩目的中医论争，也是各类名人展现自身素质的大舞台。某些名人借明星不幸逝世的个案来炒作生事的恶俗之举，不仅受到广大网民的激烈抨击，也被有关部门斥为无德，不提也罢。倒是著名西医凌峰力挺中医，值得我们深思。

作为神经外科的权威人士，凌峰女士在长期救死扶伤的医疗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了中西医结合给病人带来的好处。所以，她胸怀宽广，没有门户之见，不排斥中医，真正从病人的利益出发，实事求是，是坚持科学精神的楷模。

而某些唯科学主义者则不然，他们宣称只有近代科学才是衡量一切知识的标准，将中医当作伪科学来打击。这实际上是把唯科学主义冒充为科学精神，可以说他们是在宣传一种“伪科学精神”。毕竟，多元开放而不是垄断霸道，才是科学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与唯科学主义者截然相反，国内的一些“科学文化人”坚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坚持多元文化观。他们认为，今天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科学，其实也只是无数地方性知识中的一种。因此，必须充分尊重不同文化的价值，对非主流观点敞开发言渠道，尊重科学之外的文化形式。要紧的不是如何才能消除歧见，而是如何才能地丰富人类的思想存量，保全和发展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具体到中医，他们认为，现代还原论科学并不是真理的化身，不能将现代还原论科学作为衡量人类文明的唯一标准。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悠久，疗效明显，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过并且仍然在做出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中医作为医疗手段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容置疑。

以上这些被论敌污蔑为“反科学文化人”的观点是否过于偏激呢？不是！2007年春中国科学院在《关于科学理

念的宣言》中，明确要求科学工作者“避免把科学知识凌驾其他知识之上”。这应该说代表了中国科学界的主流心声。

是不是像少数人猜测的那样，堂堂中国科学院为一小撮“反科学文化人”所“忽悠”，违反了科学精神呢？绝非如此！这是中国最高科学机构顺应时代潮流，与国际科学界先进文化接轨的产物。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世界科学大会发表了《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宣言》，明确指出：传统和民间知识是认识世界和了解世界的重要手段，在历史上曾经对科学技术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必须保存、保护、研究和发扬这种文化遗产和实际经验知识。

会议主张，现代科学不是惟一的知识。传统社会孕育并完善了各自的知识体系，涉及到人类生活的诸多领域。这些知识体系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它们不仅蕴含着现代科学迄今尚未了解的信息，而且也是世界上其他生活方式、社会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的其他关系以及获取与创造知识其他方式的反映。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科学家们越来越从单一角度看待自然世界。因此，有必要采取特别行动，保护和培育这一脆弱而又多样化的世界遗产。

在目前中医论争中，有人虽然承认中医的医疗实践中包含了有效的、宝贵的经验。但是，他们认为中医作为知识体系是伪科学，提出要废除中医的知识体系，只保留经过所谓科学方法审核后可以为近代科学所认可的某些中药和治疗方法，即所谓的“废医存药”或者“废医验药”。

然而，世界科学大会对待传统知识的态度却与此迥然有别。会议特别提醒，应促进对传统知识系统的全面了解和运用，而不应根据人为的判断片面来利用对科学和技术有用的成分，应该在科学知识和传统知识之间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促使双方共同进步。

因此，西方学界与主流社会正逐渐摆脱偏见，开始重视近代西方科学医学之外的各种替代医学传统的价值。例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作为西方医学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包括中医在内的替代医疗研究的资助力度，表现出了令人赞赏的科学态度。

因此，在中国坚定地支持中医发展，不仅是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更是对科学精神的真正坚持。

中医应坚持自己的传统

许多认为中医不够“科学”的人，往往承认中医在诊断和治疗上是有效的，但批评中医缺乏“科学”的理论，不过是经验的总结，所以只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不够普遍化，需要像西医那样“科学化”和“现代化”。然而，这种观点在科学哲学上是过时的，按照当代科学哲学的新发展——科学实践哲学的观点，中医应坚持自己的传统。

科学实践哲学认为，即使是现代高度理论化的科学，也同样是地方性知识。因为，现代科学知识的发现与辩护都要依赖于特定的与境（context），这不仅包括概念、理论意义上的“语境”，也包括了相关科学实验操作的环境、条件等等。伽利略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显然，它不能在秋风落叶中得到辩护和证实，必须要在实验室抽真空的情形下，才能见证羽毛和硬币一同下落的“奇迹”。哥白尼的地动说，也必须要在伽利略的相对运动的理论框架中，才能得到有力的辩护。

现代科学所发现的科学规律，并非自然现象所直接显现出来的内容，它是科学家们通过科学实践，用实验室的人工环境和理论框架艰难地构建出来的，其有效性也必须要这种人工环境和理论语境中才能得到比较严格的证明。从这个角度看，科学知识其实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只不过这种地方性，并不受民族、国家等地理方面的限制。它的地方性体现在实验室的人工环境与科学理论的话语语境两个方面。一旦我们脱离了实验室严格控制的条件，它就“失效”了。因此，以现代科学为标准来强求中医，就是以一种地方性知识来强求另外一种，是毫无道理的。

而我们所艳称的“科学普遍性”，并非是在不依赖任何语境意义上说的，而是指科学知识“原则上”可以普遍地应用。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瑟夫·劳斯把这个意义上的科学知识普遍性，称之为科学的“标准化”。科学知识的应用，同样离不开相关的“与境”，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整体框架与按照实验室条件所规范的人工环境。

科学知识之所以看起来普遍有效，恰恰是因为我们用科学文化的语言改造了整个社会文化的语言，改造了应用科学技术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把整个社会以及人类力所能及的自然环境改造成成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只有在此情形之下，科学才能表现出其真理性。可见，“科学普遍性”是复杂的社会实践的结果，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依赖于相应的社会实践，依赖于巨大的文化资源和物质投入。

在这一“普遍性”的意义上，中医与现代科学的差别只是程度上的，而非本质上的。鉴于二者在文化资源和投入上的巨大差距，很难说究竟谁更有效率。其实，如量子力学波粒二象性、相对论的时空观，要为普通人士乃至职业科学家们所接受也并不容易。而中医在治疗其他民族的病人也同样有效，也正逐渐为外国学者所接受和掌握。其次，我们之所以觉得现代科学比中医要“概念明晰”，其实是因为我们接受了整个西方文化的全面洗脑，而缺乏中国传统的文化培养。西学东渐之初，中国人没有接受西方文化的基本思路时，反而觉得中国人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的思想天经地义、清楚明白，而西人的思路则难以理解。

如果脱离了中医今天在异质的近代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不利处境，泛泛地谈中医理论概念不明晰，认为中医的出路在于首先明晰相关概念的话，所谓概念澄清就很可能以西方文化为基准而展开，那是一种变相的以西医思路改造中医的路线，是没有前途的。

我认为中医的复兴，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再创造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更多的物质投入。这并不意味着，中医要坐等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因为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角度看，西方科学传统作为地方性的文化，逐步获得了全球的主导地位，自然与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有关，归根结底是由于其强有力的实践操作。例如，当年牛顿的微积分，概念很不明晰，但是由于其强大的解决问题能力，数学家们很早就接受了它，许多年后才澄清概念。

所以，中医的发展关键不是要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去澄清概念，而是要坚持自己的独立传统，不以西方话语来否定和怀疑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中医理论，营造有利于中医按照自身规律独立发展的软硬环境，不断提高医疗实践的能力，围绕医疗实践来发展理论，明晰概念。当越来越多的人都能通过中医的实践有效性，接受阴阳五行经络脏腑理论的真理性，逐步消除以源于西方文化的理论框架为唯一判断基础的偏见时，中医的“科学性”问题就彻底消解了。